

《明词综》编纂考

陈水云

关于《明词综》的编者,一般认为是乾隆、嘉庆时期著名诗人王昶,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其实,《明词综》在康熙时期已编成初稿,直到嘉庆五年(1800)才由王昶访得旧稿,并重新启动编纂工作,经过二年多的补辑和完善,终于在嘉庆七年(1802)刊刻行世。那么,《明词综》的最初编纂者是谁?为什么会等到一百年以后才被刊刻行世?

这事还得从《词综》的编纂说起。清初康熙年间,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(1629-1709),因不满《草堂诗馀》对明末清初词坛的不良影响,想着手编选一部新的选本取代《草堂诗馀》。先是在康熙十一年(1672)编成十八卷的初编本《词综》,但他深感这一选本还有诸多不足,又联合汪森(1653-1726)、周筼(1623-1687)、柯崇朴(生卒年不详,约在康熙雍正年间)等人,广征博采,详加稽考,终于在康熙十七年(1678)完成了三十卷本《词综》,并由汪氏裘杼楼刊刻行世。后来,汪森又与沈进、周筼对三十卷本做了补编的工作,并在康熙三十年(1691)推出三十六卷本《词综》。在完成《词综》的编纂工作后,朱彝尊还提出过选编明词的设想。他认为明词纵然有着诸多不足,或“陈言秽语,俗气薰入骨髓”,或“强作解事,均与乐章未谐”;但像杨孟载、高季迪、刘伯温辈,“温雅芊丽,咀宫含商”,李昌祺、王达善、瞿宗吉之流“亦能接武”^①;更值得注意的是,在明末崇祯之际,“江左渐有工之者,吾乡魏塘诸子和之。前辈曹学士(尔堪)雄视其间。守其派者,无异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”^②。从这个角度看,有明三百年中岂无合作?“当遍搜文集,发其幽光,编为二集,继是编之后”^③。这个“二集”之称,意味着朱彝尊当初很可能是准备将这个明词选本命之为《词综二集》的,而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《明词综》。这样的称谓在明末清初也是比较普遍的,比如邹祗谟、王士禛选编《倚声初集》,顾贞观、纳兰性德合选《今词初集》,佟世南编选《东白堂词选初集》,都是有着“二集”之选的意图的。

①朱彝尊:《词综·发凡》,《词综》“卷首”,岳麓书社,1995年,第14页。

②朱彝尊:《柯寓匏振雅堂词序》,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十,《四部丛刊》本,商务印书馆,1936年。

③朱彝尊:《词综·发凡》,《词综》“卷首”,第14页。

朱彝尊虽然提出了这一设想,却未能将之付诸实际行动,有学者认为造成这一想法落空的原因是,在编纂《词综》初编完成后,他被选入明史馆,生活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^①,幸运的是朱彝尊这一设想被汪森化为现实。汪森《沈蓝村小传》便提到他与沈进(1628-1691)(字山子,号蓝村)共选明词的情况,他说:“壬戌(康熙二十一年),(沈进)馆余勤有居,助余续辑《词综补遗》,并搜录明人词,《词综》之补人补词既就梓,而明人词笥谷(周笈)携之京师,被友人取去,不复返,竟未获成书。”^②这说明,汪森选辑明词的工作,至迟在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已经启动,而且是与《词综》后六卷(卷31-36)的搜集工作同步进行的。他在《送周笥谷北游序》中提到,周笈(字青士,号笥谷,嘉兴人)是康熙二十四年(1685)秋游京师的,也就是说,由汪森、沈进编选的这部明词选本,在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已完成初稿。他的另一篇文章《选明词序》,还专门谈到选辑明词的来源和范围:“暇日偕友人沈蓝村健户溪堂,由洪、永以迄启、禎,阅集千馀,旁采选本并题画书册、刻石鐫壁,不可屈指,仅得词若干卷。”^③很显然,为了编选这部词选,汪森与沈进“阅集千馀”,范围上涉及总集、别集以及其他载体(题画书册和刻石鐫壁),这是一部时间上涵盖有明一代(从洪武到崇禎)的选本。据其孙汪筠《校〈明词综〉三首》所言,这部选本当时被命之为《明词综》,而不是前面朱彝尊所说的“词综二集”。

其实,在汪森选编明词之前,已有一些明词选本问世,比如钱允治编、陈仁锡释的《类编笺释国朝诗馀》和顾璟芳、李葵生、胡应宸合选的《兰皋明词汇选》。但前者选录范围过窄,造成很多名家落选,故有“玉石杂陈,竿瑟互进”之讥^④;后者虽则范围有所拓宽,但大家漏选亦复不少,且疏于考辨,以致将宋人作品当作明人作品收录,更重要是,它存在着眼界不高的不足,大量庸滥之作悉数阑入。作为清初著名的藏书家,汪森在编选明词时应该是浏览过这两部选本的,对其存在的问题也当然是有清醒认识的。如果说这两部选本是在肯定明词的前提下编选明词的,那么汪森则是在总体上否定明词的前提下选辑明词的,他主要是从存人存史的立场来编选明词的。他说:“一代之人物必有一代之论著,论著者一代之风声气习也。明之继元,承虞、欧、黄、柳诸家之后,金华(宋濂)、宁海(方孝孺)之文,遂为开国宗工。然不立门户,不事标榜,以文章功业为己任。自是而降,奇才辈出,谓秦汉以下书不足读,及视其功业与其论著且不能肩随李杜,而名位卒亦不显。呜呼!余读刘文成(刘基)诗,而知奇才之不可以绳尺限也,文成当元之季世,无论开国功臣,即所论著,为第一流人物。”^⑤在

①于翠玲:《朱彝尊词综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43页。

②汪森:《小方壶文钞》卷六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8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468页。

③汪森:《小方壶文钞》卷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85册,第438页。

④沈际飞:《草堂诗馀四集》“发凡”第五条,明崇禎年间翁少麓刊本。

⑤汪森:《选明词序》,《小方壶文钞》卷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85册,第438页。

在他看来,明人受前后七子复古思想影响,对秦汉以后的文章著述大都束之不看,但是,作为一代之论著,明人文章也其特殊的时代价值,亦即他们的论著是“一代之风声气习”的真实呈现,从这个角度看,明词的出现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:“倚声小道也,文成以缠绵悱恻之情,发为墨妙而时形其忠爱;他如青丘(高启)、眉庵(杨基),不趋故步,亦足以继轨前贤。而瞿宗吉(祐)、马浩澜(洪)之徒,愈趋愈下,词之道浸以衰微。至若正、嘉诸贤,号称博洽,强名解事,拾《草堂》之坠绪,为风雅之末流,其沿极于败坏而不可止。嗟乎!诗未亡,而诗馀之道丧已久矣。故宁有成、弘间之高视阔步,鄙不肯为,不可使正、嘉之后为之而宣欲导淫也。是以明词不必选,又不可不选。其不可不选者,不当使千季之制自此而坠;而不必选者,谓作法于凉后将不振也。虽然,不灼乎源而身蹈其流,与任其流而不复浚其源,其弊正相等。”^①很显然,汪森对明词的看法,大体上沿袭了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发表的意见,对明初能继轨唐宋表示认同,对正、嘉以后所作予以全盘的否定,但从词史发展的角度、从源流正变的角度看,他选辑明词与编选宋元词一样有着正本清源的意图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,《词综》不但以人编选,列有作者小传,还对词人的生平籍贯详加考证,因而具有“词史”一样的功能^②。汪森选编明词也是为了“以存一代之人物,使起衰者得从是以追蹑前人”。如果说《词综》尚有开宗立派的意味,那么他选编明词则体现的是一种“不立门户,不事标榜”的词史意识。

汪森在《明词综》编选成书后,曾致书征求朱彝尊的意见,朱彝尊对他的做法表示认可。据汪森《沈蓝村小传》所述,这部选本后来被周赏携至京师,为友人取去不复返。那么,它是否真的在人间失传了呢?王昶在编《明词综》时,曾提到“竹垞太史(朱彝尊,字锡鬯,号竹垞)于明词曾选有数卷,未及刊行,今其本尚存汪氏”,这句话是汪康古亲口对他讲的,它说明这一选本并没有从人间消失。汪康古(1721-1770),名孟錡,字康古,号厚石,为汪森曾孙,继燦之孙,上埏长子。乾隆十五年(1750)举人,三十一年(1766)进士,曾官吏部主事,与钱载(1708-1793)、王又曾(1706-1762)、万光泰(1712-1750)等交往尤密,为乾隆时期秀水派的重要成员,有《厚石斋集》十二卷。他比较自觉地承传了家族的宗风,把《词综》作为其家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来传承:“遗书万卷细披寻,裘杼楼中有嗣音。自执红牙轻按拍,酒阑灯妣一微吟。”^③汪森之孙汪筠(1715-?)^④在其祖去世十年后曾撰文说:“先大父碧巢先生(汪森,字晋贤,号

①汪森:《选明词序》,《小方壶文钞》卷二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185册,第438页。

②李睿:《清代词选研究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180页。

③冯浩:《题汪孟錡〈理冰词〉四首》之二,《孟亭居士诗稿》卷一,清嘉庆七年(1802)刻本。

④据周清彭《〈再生缘〉作者的母族桐乡汪氏》考证,汪森本无子,以其弟文桂之子继燦为子,继燦有六子:廷英、上埏、上埏、上壤、上垂、筠,上埏又有子四:孟錡、仲汾、铿、彝铭(《国学研究》第12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年)。

碧巢)既偕竹垞朱先生有《词综》之刻,后数年,复偕蓝村沈先生取有明一代之词蒐逸订讹,仍质诸竹垞,以续前辑,犹虑甄综未备,迟之晚年,竟愆剞劂。暇日出手钞本重校之,愿有以成先志也,因书其后。”^①又《校〈明词综〉三首》其三云:“粉蠹精华卅餘载,赏心犹见手钞初。正须枣木流传亟,幼妇尊前续一书。”^②这篇文字撰写时间是在乾隆元年(1736),正说明“尚存汪氏”之言不诬,它是以稿本形式(手钞)保存在汪家的,而且已被搁置在汪氏裘杼楼达三十余年之久。他还表示,欲承先祖之遗愿,对原编本作校勘的工作,期待有朝一日能雕版印行。

汪森选编的《明词综》一直未能印行,直到王昶的出现,《明词综》的重编及雕印才有了转机。王昶从汪孟鋇处获知,汪森这个本子尚存人间,便有意寻访,但一直未有所获,直到嘉庆五年(1800),偶遇汪淮后才得以获见该稿本。汪淮(1746-1817),字小海,号兰皋,汪森四世孙,为汪森长孙廷英之后,有《小海自定诗文集》二卷、《黟山纪游》一卷^③。在获得稿本后,王昶着手重编,历时二年,共辑得391家,凡12卷,并雕版行世。今存嘉庆七年本《明词综》,扉页左印“三泖渔庄藏版”,右印“王述庵少司寇续选”,这表明他的编选是在汪森、朱彝尊的基础上进行的。但是,《明词综》明明是为汪森所编,为什么王昶在《明词综自序》开篇却说“竹垞太史于明词曾选有数卷”?大约是他坚信朱彝尊在《词综·发凡》中所说的那句话:“当遍搜文集,发其幽光,编为二集,继是编之后。”认为汪森之所编如其编《词综》那样,也是在朱彝尊选编的基础上进行的,还因为他比较推崇朱彝尊的词学思想,以自己重编之《明词综》意在承续由朱氏而来的浙派词统,“选择大旨,亦悉以南宋名家为宗,庶成太史之志云尔”^④。另外,汪森在编成之后,也确实征求过朱彝尊的意见,亦是一因。《明词综》从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启动编纂,到嘉庆七年(1802)雕印行世,前后历时120年之久,这是清代词选编纂史的一道特有“风景”。

王昶(1725-1806),字德甫,号述庵,一字兰泉,又字琴德,青浦人。乾隆十九年(1754)进士,官至刑部右侍郎,他是中期浙派的主要词人,有《琴画楼词》四卷传世。他编刻《明词综》的最初动机,是有感《词综》一书所收止于元而止,“以其不及明词为憾”。因此,他意欲继朱彝尊、汪森未竟之业,将《明词综》置于《词综》之后,一起刊刻印行。从《明词综》的实际情况看,无论是体例的安排,还是作者生平事迹的辨证,以及作品的选择等,都明显受到了《词综》

①汪筠:《校〈明词综〉三首序》,《谦谷集》卷三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10辑第21册,北京出版社,2000年,第98页。

②汪筠:《校〈明词综〉三首序》,《谦谷集》卷三,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第10辑第21册,第99页。

③秦瀛:《贡生汪小海墓志铭》,《小岘山人续文集》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465册,第356页。

④王昶:《明词综自序》,《明词综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730册,第621页。

的影响。从体例的安排看,先是帝王,后是一般词人,最后是闺秀和妓女,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;从作者生平小传看,主要简述字号、籍贯、生平、著述等,有的还附有对词人词作的评论;当时,他正讲学于杭州敷文书院,得与诸生相切磋,一些文字校勘的工作便是由其门生完成的^①。从他对作品的选择看,“大旨亦如竹垞太史所云”,以雅正为宗,对于明词的态度,大体上是沿袭朱彝尊和汪森的相关看法:“盖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、张仲举之旧,不乖风雅;及永乐以后,南宋诸名家词,皆不显于世,惟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诸集盛行。至杨用修、王元美诸公,小令、中调颇有可取,而长调则均杂于俚俗矣。然一代之词亦有不可尽废者,故《御选历代诗余》撷取者一百六十馀家。”^②如果将《明词综》的目录与正文相比照,还能看到王昶刻本对汪森稿本沿袭的痕迹,比如卷一目录刘基题9首,正文则仅存8首;高启题4首,实存2首;杨基题7首,实存5首;谢应芳题3首,实存2首;张肯题6首,实存5首;卷二顾潜题4首,实存3首;史鉴题1首,实为5首……这些差错或出入的存在,正说明王昶对于汪氏稿本有增有删,因为《明词综》有些后期的编辑工作是由其学生来承担的,所以在刊刻时也就出现了目录与正文不相符的情况。对于王昶重编之《明词综》的得失,当代学者已有精辟论述^③,最值得一提的是,为了使明词符合其雅洁的标准,编选者不惜亲自动笔,对所选之作作大幅度的改动,从文献学亦即保存文献真实状态角度看,这一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,也有违朱彝尊、汪森当初编《词综》之严谨态度,据此推断,王昶之刻本与汪森稿本之《明词综》应该有较大出入。

《明词综》最早刻本是嘉庆七年(1802)青浦王氏三泖渔庄刻本,而后有光绪二十八年(1902)金匱浦氏重刻本,与《词综》、《国朝词综》、《国朝词综二集》一起合刻。又有民国二十三年(1934)上海中华书局《四部备要》铅印本,民国二十七年(1938)上海商务印馆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,以及赵尊岳惜阴堂《明词汇刊》本(又称《惜阴堂明词丛书》),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“新世纪万有文库本”《明词综》(王兆鹏校点本)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武汉大学文学院

①严荣:《王述庵先生昶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78年,第100页。

②王昶:《明词综自序》,《明词综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730册,第622页。

③张仲谋:《明词综研究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七十八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。